

第 1 章

持续停滞： 1973 ~ 1993 年

要 想准确的评估当前美国经济的状况，就必须把分析的起点放在长期性的经济衰退上。下述事实不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即美国经济从 1993 年以来所呈现的强劲增长势头，是在全球性经济增长停滞的大背景下实现的，后者一般被认为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在此之前，确切地讲，从 20 世纪 4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主要发达国家都处于长期的经济繁荣阶段，经济增长迅速、投资、产出、产量、生产率及工资等指标的增长率都接近或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而失业水平却非常低；即便出现经济衰退，也是非常短暂和轻微的。但在随后到来的长期衰退阶段——70 年代初期到 90 年代中期，投资增长迅速下降，由此导致生产能力被大幅度压低，工资增长异常缓慢（尽管尚未出现绝对下降）；伴随而来的是萧条性失业（不包括美国）的出

现，以及经济衰退与金融危机的不断爆发。如果纵向比较就会发现，从 30 年代到 70 年代之间，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情况。90 年代前半期的真实情况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缺乏发展的动力，与 80 年代的增长率相比，本期的增长仍然非常缓慢；而事实上 80 年代的经济增长率比 70 年代的水平要低，当然更不如 60 年代的增长水平了（见表 1-1、表 1-10）。

因此，一个首要的问题是，哪些力量导致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战后长期繁荣局面的终结，并进而造成了随后二十多年的持续性经济增长停滞？只有区分出这些作用因素，并分析他们现在是否仍然对全球经济发展发生作用——不论是直接的或是间接的，我们才能真正对美国经济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强劲增长势头做出正确的评估，断定它是否意味着经济正步入另一次长期繁荣，抑或仅仅是一个插曲，甚至反而由此引发更为严重的经济问题？

1.1 从长期繁荣走向长期衰退

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长期经济繁荣——从 20 世纪 40 年代末直到 70 年代初——的关键，是利润率的变化轨迹；可能这一因素也适用于对随后发生的长期衰退的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之所以会出现空前迅速的经济增长态势，是因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有能力实现并维持高利润率水平。在所有影响因素中，高水平的利润率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它使得这些经济体能够在任何给定的厂房和设备（资本存量）的配置条件下，获得相对更大的经济剩余。这些经济体就能够维持较高的投资率，并带来产量的迅速增长；这样，在不侵蚀利润的前提下，实际工资也能维持较为迅速的增长。在这一阶段，资本的平均收益率很高，只有相对极少的公司面临破产倒闭。结果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经济动荡的弱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大大抑制了，

表 1-1 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长期繁荣阶段与长期衰退阶段各项经济指标比较
(除净利润率与失业率为平均值外, 其他指标均为年均变化率)

单位: %

制造业 年份	净利润率		产 量		净资本存量		总资本存量		劳动生产率		实际工资	
	1950 ~ 1970	1970 ~ 1993	1950 ~ 1973	1973 ~ 1993	1950 ~ 1973	1973 ~ 1993	1950 ~ 1973	1973 ~ 1993	1950 ~ 1973	1973 ~ 1993	1950 ~ 1973	1973 ~ 1993
美国	24.35	14.5	4.3	1.9	3.8	2.25	—	—	3.0	2.4	2.6	0.5
德国	23.1	10.9	5.1	0.9	5.7	0.9	6.4	1.7	4.8	1.7	5.7	2.4
日本	40.4	20.4	14.1	5.0	14.5	5.0	14.7	5.0	10.2	5.1	6.1	2.7
七国集团	26.2	15.7	5.5	2.1	—	—	4.8	3.7	3.9	3.1	—	—

注: 七国集团净利润率的统计截止到1990年; 德国净资本存量的统计跨度为1955~1993年; 日本的净利润率和净资本存量的统计跨度为1955~1991年。

私人企业 年份	净利润率		产 量		净资本存量		总资本存量		劳动生产率		实际工资		失业率	
	1950 ~ 1970	1970 ~ 1993	1950 ~ 1973	1973 ~ 1993	1950 ~ 1973	1973 ~ 1993	1950 ~ 1973	1973 ~ 1993	1950 ~ 1973	1973 ~ 1993	1950 ~ 1973	1973 ~ 1993	1950 ~ 1973	1973 ~ 1993
美国	12.9	9.9	4.2	2.6	3.8	3.0	—	—	2.7	1.1	2.7	0.2	4.2	6.7
德国	23.2	13.8	4.5	2.2	6.0	2.6	5.1	3.0	4.6	2.2	5.7	1.9	2.3	5.7
日本	21.6	17.2	9.1	4.1	—	—	9.35	7.1	5.6	3.1	6.3	2.7	1.6	2.1
七国集团	17.6	13.3	4.5	2.2	—	—	4.5	4.3	3.6	1.3	—	—	3.1	6.2

注: 七国集团净利润率的统计截止到1990年; 德国净资本存量的统计跨度为1955~1993年。

资料来源: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民核算账户》,1960~1997,第二卷,明细表;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固定资本流量与存量》; P. 阿姆斯特朗 (P. Armstrong)、A. 格林 (A. Glyn)、J. 哈里森 (J. Harrison),《1945年以来的资本主义》,附录,牛津出版社1991年版; P. 阿姆斯特朗 (P. Armstrong)、A. 格林 (A. Glyn)、J. 哈里森 (J. Harrison),《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积累、利润与政府消费: 1952~1983年》,牛津经济学与统计学学院,1986年7月,修订者: 格林 (A. Glyn)。

经济衰退出现的次数很少，程度也相当轻微。另外，由于投资者在做决策时几乎别无依据，而只能依赖于现实利润率来判断投资前景（预期利润率）；这自然产生如下后果：高利润率的维持造就了战后二十多年经济发展的牛势，并回过头来进一步促使资本实现加速积累（见图 1-1）。

战后繁荣的基础

美国公司从 20 世纪 30 年代末开始，日本、德国等其他西欧国家的公司从 20 世纪 40 年代末开始，均取得了高利润率的经营业绩，这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战后长期增长的基本前提。起初，高利润率的实现，是以镇压或约束武装工人起义为基础的。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人武装起义席卷了整个发达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游戏规则”的存在发生了危机；但这些起义都未取得成功，相反，起义被镇压后劳动者完全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①与产出水平相比，实际工资因此得以压低，这当然意味着制造商所获得的净剩余相对于其资本存量更大。高利润率保证了资本积累率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从而提高了生产率、扩大了就业规模，增加了实际工资，并最终造就了长期经济繁荣。自然地，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迅速提高也随之出现，经济增长的螺旋作用机制因此形成了。

美国经济的起飞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确切地讲，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到 40 年代中期。在经济萧条时期，大量落后过时的资本存量被淘汰，实际工资因大规模失业的存在而被压低，创新在生产中的应用过程也被大大延迟，再加上针对 1934 ~ 1937 年爆发的劳动力大转移而出台的遏制政策，所有这些因素

请参阅 P. 阿姆斯特朗 (P. Armstrong)、A. 格林 (A. Glyn)、J. 哈里森 (J. Harrison)：《1945 年以来的资本主义》，牛津出版社 1991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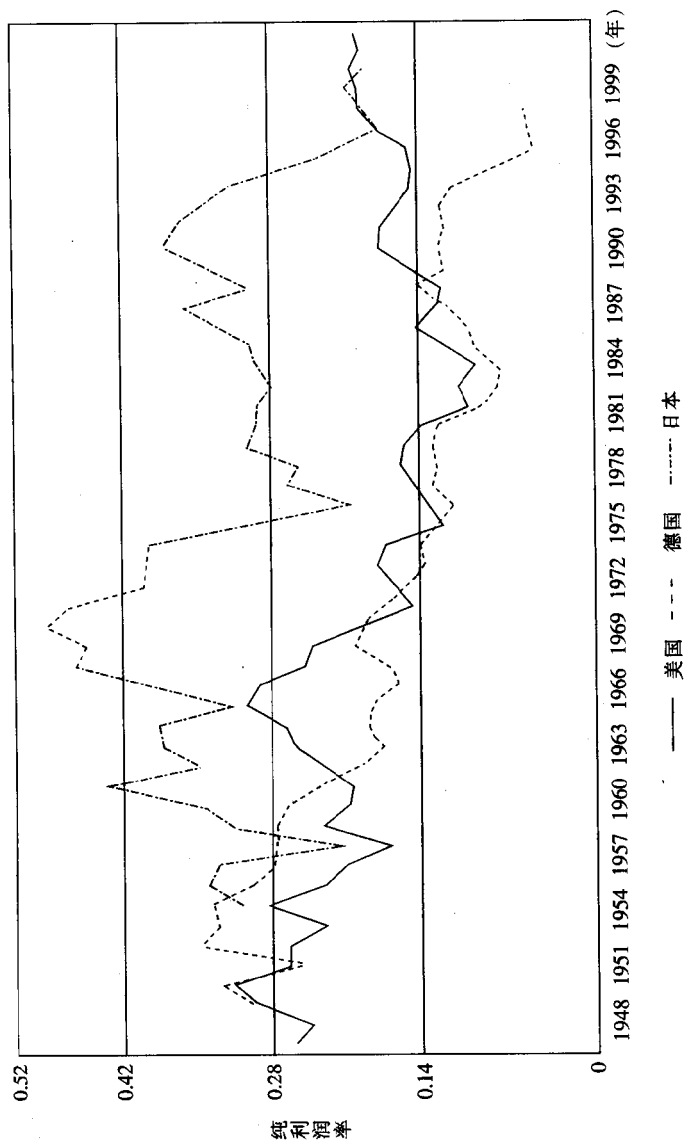


图 1-1 制造业的纯利润率：美国、德国和日本（1948-1999 年）

最终实现了生产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从而为即将出现的长期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强大的战时需求刺激了美国经济，使其得以维持高利润率，由此形成经济的有力扩张，而美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权也因此得到巩固。此时的日本和西欧经济，则正在经历着战火的洗礼，他们只能等到战后才会获得了重建。^①

尽管经济的高速发展巩固了美国的领导地位，但要保持高水平的投资增长率，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初期发达的技术——体现为大量固定资本投资；更先进的社会经济结构——表现为规模相对很小的农业和商业部门，及不太严重的劳动力过剩供给；世界霸主地位——表现在其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经营的延伸；规模巨大的银行体系；当然还包括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所有这一切，不仅没有加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另外，工人阶级尚存的反抗力量也有效地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从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经济就已经开始缺乏增长的动力而陷入衰退，突出的表现是资本积累速度的不断放慢。

使用既存的厂房设备对企业而言是不计入成本的。但这些厂房设备能够运转的必要条件是，在消耗一定量流动资本（工资、原材料、半成品）——这是推动固定资本运转所必需的——的前提下企业所能获得的利润率至少等于平均利润率水平。这样，大量既存的——换而言之即已经支付了成本的——（沉淀的）固定资本客观上削弱了进一步进行资本积累的积极性。这些沉淀资本还在很大程度上堵死了那些拥有更先进技术的潜在竞争者的进入通道。否则的话，单位成本将低于现有的单位总成本，尽管它不会低于现有的单位流动成本。美国乡村和历来充斥冗员的家庭企业中的“产业后备军”规模的相对削减，使得劳动力供给的

^① G. 杜曼尼尔 (G. Dumenil) M. 格里克 (M. Glick) D. 莱维 (D. Levy): “二战期间利润率的变动——上升”，载《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第65卷，1993年5月；R. 布伦纳 (R. Brenner) “全球动荡经济学”载《新左派评论》，第229期，1998年5~6月，第48~49页。

增长无法满足企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工资水平因此迅速提高。与此同时，西欧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主要的获利机会，美国的跨国公司开始大量增加海外投资的份额；另一方面，不断提高的国际贸易相对成本也削弱了他们在美国国内投资的愿望。由于投资增长减速所导致的生产率增长的不放慢，以及实际工资的增长，共同促成了 20 世纪 50 年代末美国国内利润率增长的停滞。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是，美国的经济增长呈现出严重的停滞态势，尽管在 60 年代前半期曾经有过短暂的增长，但总的看来，增长停滞一直贯穿于美国经济在战后前 25 年的始终。^① 那么，战后全球经济持续强劲增长的动力到底来自于哪里？我们认为，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后起国家（later-developing economies）的经济发展，尤其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还包括法国、意大利等国家。这些经济体的资本积累率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一直保持在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上。自然，这种高水平的资本积累率的保持，又是以高利润率的维持为条件的。众所周知，经济高速增长的伴生物是成本的不断上升，能在这种压力下实现和保持高利润率，显然着实不易。

这些后起国家的制造商之所以能够应对成本上升的压力，使本国经济保持较高的盈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恰恰是因为他们的落后地位。由此所产生的后发优势之一，是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结构，相对落后的农业和小工商业部门对大量半失业工人的吸纳，这种状况导致工资的增长大大慢于生产率的增长。^② 另外，这些国家不是技术创新者，而是新技术的追随者，因此没有太多的标志着过时技术的沉淀固定资本，其经济增长的负担较轻。而且，在大规模投资过程中实现的“边干边学”和规模经济学，

① H. G. 沃特纳（H. G. Vatter）：《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经济》诺顿公司 1963 年版；R. 布伦纳（R. Brenner）：“全球动荡经济学”第 49～63 页。

② C. P. 坎德·勒伯格（C. P. Kindleberger）《战后欧洲经济增长与劳动力供给》，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7 年版。

使得他们可以利用追赶的机会，吸收美国廉价而先进的技术，并有所创新，甚至在某些方面取得领先地位。^①

后起国家中的一流企业还能从一系列制度形式和政府政策——它们是专为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国际竞争力而制定实施的——中获得不少实惠；而对于那些已经先期发展起来并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的美国竞争对手来说，这些优惠或者是不值一提，或者是根本无法获得。这些企业能够和大银行保持密切的联系——即所谓的“融合”，由大银行监督企业的运作，并在此基础上提供相对便宜的长期贷款，在市场波动时为企业提供符合需要的服务。另外，这些企业还加入了多种形式的纵向和横向网络联盟，保证了更大程度的企业间协调与合作，进而能够考虑更大的计划，大幅度削减要素成本，以及谋求更为安全和可靠的市场。

后起国家的政府也在或多或少有系统地实施各种措施，以加强本国制造商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不可否认，这些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与银行这两个利益相关者联合努力的结果，它们凭借其经济主导地位，对政府施加了十分有效的影响。当然，经济增长关系到各国政府的自身利益，这一点也是同样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国家通过提供补贴、贬值通货，以及在不同时期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扶持民族产业的成长。另外，他们还有意采取了“金融抑制”政策，不仅严格规制国内借贷者和投机者的行为，而且对国际游资也实施了强有力的限制。这种“金融抑制”政策的目的，就在于保证金融领域的稳定，以免对国内制造业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上述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这些国家民族产业的生产效率大

^① M. 艾伯罗莫维茨 (M. Abramovitz): “高速增长的潜力及其实现——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见麦林沃德 (编):《经济增长与资源》国际经济协会 1977 第五次全球会议论文集, 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 1977 年版; M. 艾伯罗莫维茨 (M. Abramovitz): “追赶与收敛——战后经济繁荣与未来发展”, 见 W. J. 鲍莫尔 (W. J. Baumol)、R. R. 尼尔森 (R. R. Nelson)、E. N. 伍尔克 (E. N. Wolff) 编辑:《生产率的收敛: 国际比较研究及历史依据》,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大提高，这一点对于国民经济增长来讲自然是至关重要的。很明显，这种状况和美国经济增长的相对缓慢形成了鲜明对照。此时，美国向海外市场的扩张已经较少地采取扩大出口的方式，而更多地采取了生产国际化的方式，后者主要由跨国公司和银行推动，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的重新布局。美国政府大力支持这种形式的经济扩张，并不惜动用各种力量来建立一个全球性的自由经济区——不仅包括贸易自由，更包括长期和短期的资本自由流动。但在某些时候，作为一种代价，构成美国经济基础产业的国内制造业，则因此蒙受惨重损失。^①

落后的社会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的追随者，以及受霸权支配的国际地位，这些因素对后起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反倒成为有利条件。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因此保持着惊人的速度，其海外市场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并带动了国内制造业部门——生产率增长最为迅速的领域——飞速发展，其规模之大甚至有些不合比例。^② 这些国家的制造业之所以能够保持这么快的增长速度，首先是有赖于战后经济繁荣所带来的全球贸易的空前迅速增长。再者，这也和它们能迅速扩大自己在全世界贸易的份额有着莫大关系。尤其是德国和日本的制造业，其产品出口额的增长速度更是快得惊人。过去，在国际出口市场中占大头的是美国和英国制造商；现在，德、日制造商不仅争夺到了原本属于美、英的国际出口市场，甚至还成功地打入到美国国内市场。^③ 在这个背景下，德国和日本分别成为欧洲和东亚的区域性经济集团的发展轴

① F. 布洛克 (F. Block) 《国际经济无序的起源》，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② N. 考尔德 (N. Kaldor) 《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67 年版；N. 考尔德 (N. Kaldor) “国家经济目标间的冲突”，《经济期刊》第 80 卷，1971 年 3 月。

③ A. 梅泽尔斯 (A. Maizels) 《工业增长与全球贸易》，剑桥大学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189、200、201、220 页；A. D. 摩根 (A. D. Morgan) “出口竞争与进口替代”，《工业化与贸易基础》，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48 页；R. 布伦纳 (R. Brenner) “全球动荡经济学”第 46~47、70、88~90 页。

心——它们不仅为周边国家提供性能优良的资本品和半成品，而且还为这些国家的出口商品提供了庞大而持久的市场。（当然，日本对外来制成品输入的忍耐一直是有限度的。）^①

从一开始，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就已经使美国经济增长相对衰落了。还要指出的是，这一点之所以具有必然性，是因为它构成了美国国内各种政治经济力量保持主导地位的一个先决条件。美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银行的目标是拓展海外市场，因此它们需要为其海外直接投资寻求利润增长点。国内制造商也要求增加出口，这势必需要海外市场的迅速扩大以吸收其产品。而已经树立起霸权的美国政府，则倾向于“遏制共产主义”，保护自由企业制度免受侵害。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美国政府极力推动其盟国——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美国的竞争对手——的经济复兴，以便稳固战后资本主义的秩序；即使由此导致的战争、占领、勾结甚至失败可能会削弱国内统治阶级的力量，也在所不惜。这样，上述目标的实现，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欧洲和日本经济的复兴程度。不难看出，此时美国的经济繁荣反倒要以其竞争对手不断提高的出口竞争力为基础；当然，前提是这种竞争力的提高不会影响美国制造商在国际市场上所占份额的增长，美国国内市场不会因此受到冲击。在战后的经济繁荣期，国际市场的绝对扩张是非常迅速的，这种情况使得美国制造商同意放弃它们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的相当数量的份额，因为这种让步的代价极小。这种让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与巨大的国内市场相比，国际市场在美国制造商的眼中并不十分重要，国内市场才是他们最主要的产品销售地。而在国内，他们凭借先进的技术和庞大的沉淀固定资本所具有的威慑力，有效地阻止了潜在进入者打入本土市场，并能够一直保持市场主导地位。

R. 卡斯特里（R. Castley）：《日本在韩国经济奇迹中的关键性作用》，麦克米兰出版公司 1997 年版；A. S. 米尔沃德（A. S. Milward）：《欧洲经济复兴过程中的国家政府》，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由于美国经济的成功是如此紧密地与其他资本主义盟国的经济成功联系在一起，因此战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实现高度的经济合作，尽管持续的时间并不太长。不可否认，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对盟国 / 竞争对手的援助给这种经济合作打上了特有的印记：美国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合作的框架也主要是根据美国的利益来确定的。

对于美国政府和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来讲，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国内市场的扩大——及政治的稳定，是他们最为关心的事情，因此他们能够容忍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实施高度的政府干预行为，能够容忍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能够容忍其压低汇率，也能够容忍其采取金融抑制政策。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主导者与追随者、领先者和后起者、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的关系尽管充满矛盾和不稳定因素，但却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着休戚与共的合作关系。

生产能力过剩的肇端与盈利率危机（1965 ~ 1973 年）

然而，贸易增长与国际劳动分工的不平衡发展所带来的乐观结果并没有长久维持下去。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各国通货再次实现了可自由兑换，贸易壁垒也被大大削弱，商业贸易的增长速度更为加快；但由此导致的经济后果却并不乐观。60 年代后半期，西欧和日本制造商们把贸易盈余用于投资，这保证了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其产品供给所占国际市场的份额也大大超过了先前的水平。此前，这些国家的产品主要以内销为主，并没有对同类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构成威胁。^① 现在，这些产品转而出口到国际市场，对于国际市场上的同类美国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结构性调整与经济绩效》巴黎，1987 年，第 267 页。

商品而言，这当然意味着产品重复，而不是补充；由此出现的生产能力和产量过剩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后起经济国家——以日本最为引人注目，当然还包括德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制造商们，能够以相对较低的工资和相对更为先进的技术，来实现成本的大幅削减；而制造同样的商品，美国制造商所要耗费的成本则要大得多。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前者在国际市场上拥有价格优势，能够通过较低的价格来显著扩张其市场份额。而美国制造商的处境则非常不妙：厂房和设备等固定资本的大量沉淀导致成本削减的范围大大受到限制，后起经济集团的竞争使得美国制造业的成本现在突然变得异常昂贵；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具有一定程度的刚性，也不能很快地下降。但在另一方面，产品价格的上涨却变得越来越慢。这样，一些资本被迫压低生产能力和 / 或降低资本利用率，否则它就无法获得平均利润，甚至以流动资本——为保持固定资本（厂房、设备）运转所需的劳动力、原料和中间品——来计算的利润率也低于平均水平。其他的资本为了保持原有的市场份额，则只能咽下利润率——以固定资本计——显著降低的苦果，因为激烈的竞争使得他们无法再像以前一样，把价格提高到成本以上。

上述价格竞争对国际市场格局的冲击是出乎人们预料的，美国制造商的投资现在看来是过度了——与劳动和资本费用相应的销售价格远远高于市场价格。结果是，日本、德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凭借较低的成本和较低的价格，不仅扩张了自己的市场份额，而且能够成功地维持一般利润率水平；而美国则无法摆脱回报率下降的结局。即便从全球制造业部门的一般利润率变动趋势看，情况也不容乐观。不断降低的利润率表明，生产能力和产量的双重过剩不是局部的，而是全球性的。从 1965 ~ 1973 年，美国制造业部门实际资本利润率下降了 43.5% ；七国经济集团制造业部门——全球制造业部门的近似代表——盈利能力的综合指标也

下降了大约 25%。^①

事实上，日本、德国以及其他西欧国家的经济，也最终未能摆脱全球性制造业盈利能力下降趋势的影响。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的下降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美国的贸易和经常项目顺差不断缩小（德国、日本的贸易和经常项目顺差则相应实现了增加）。加上境外投资的增长，及越战所导致的军事开支的膨胀，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迅速飙升。相对于对美国产品和资产的需求，境外美元数量大幅度增加，这给美元币值的稳定性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并把全球货币体系推向危机。在 1971 ~ 1973 年间，以固定汇率为标志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破产，美元大幅度贬值，而马克和日元则相应升值。本国货币的升值给德、日两国制造商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现在，与竞争对手美国的产品相比，他们的相对成本剧烈上升，利润率则因此直线下降，其下降幅度甚至比迄今为止七国集团盈利能力综合指标的下降幅度还要大很多。

此时，限制全球制造业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仍然是生产能力和产量的双重过剩。关于这一结论，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尽管现在美国制造商从美元贬值中获得不少好处，但他们仍然无法再次达到战后繁荣时期的利润率水平。这种生产过剩发作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全球制造业产品的价格上涨幅度落后于固定资本费用和工资的上升幅度，这进一步导致全球范围内的制造业部门利润率水平持续下降。可以说，席卷整个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制造业利润率下降趋势，是推动全球经济从长期繁荣走向长期衰退——1965 ~ 1973 年——的首要力量（见图 1-1）。

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导致了制造业的生产过剩及随之而来的利润率下降，其波及范围不仅限于美国，整个发达资本主义经济都未能幸免。需要特别强调的一个事实是，利润率下降趋势在制

阿姆斯特朗（Armstrong）等：《1945 年以来的资本主义》，第 352 页，表 A1。

制造业部门表现得更为严重，因为这些部门的产品大多能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易，因此它们也更易受到国际竞争状况的影响。而非制造业部门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即便在其成本上涨远远快于制造业成本上涨——这意味着盈利能力的下降——的年份，其利润率下降趋势相对于制造业来讲也要轻得多。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部门的大部分产品都不能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易，因此能够免受国际竞争的冲击。以 1965 ~ 1973 年间美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部门的利润率变动为例，前者下降了 43.5%，而后的下降幅度只有 13.9%（如果不对间接营业税——对非制造业部门的征税额度大幅度提高，而制造业部门则未受影响——进行调整，那么下降幅度会更小，只有 9 个百分点）。不同商业周期的比较也显示了类似的结果，制造业部门在 1969 ~ 1973 年商业周期的平均利润率水平比 1948 ~ 1969 年商业周期的平均利润率水平下降了 29.5%，而非制造业部门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幅度只有 5.4%（见图 1-2、表 1-2）。

表 1-2 制造业部门、非农和非制造业部门、
非农私人部门的利润率变动趋势

平均利润率 (%)	1948 ~ 1959 年	1959 ~ 1969 年	1969 ~ 1973 年	1973 ~ 1979 年	1969 ~ 1979 年	1979 ~ 1990 年
制造业部门	25.0	24.6	16.6	14.0	15.05	13.0
非农和非制造业部门	11.0	11.1	10.4	10.3	10.3	9.1
非农私人部门	19.9	20.8	18.3	16.3	17.1	15.0

而且，上述利润率变动趋势，还是在下列因素反向作用的条件下实现的，即：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近 50%，远远快于同期非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制造业部门名义工资的增长速度则远远落后于非制造业名义工资的增长速度。这样看来，制造业部门无法在 1965 ~ 1973 年间维持原有利润率水平，其原因就在于其产品价格与成本的差额甚至不及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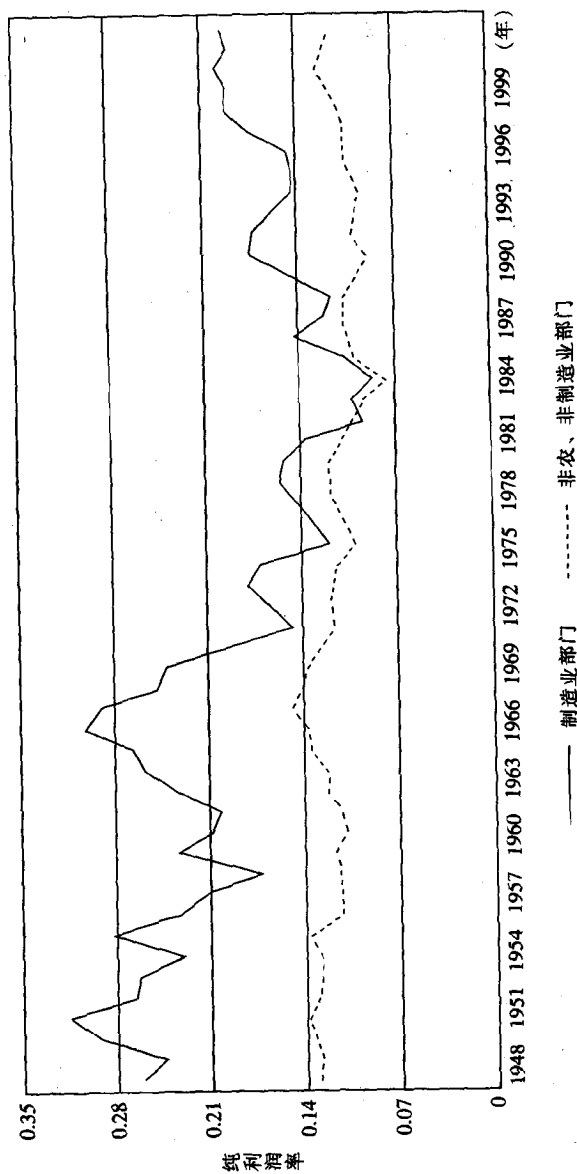


图 1-2 美国制造业、非农、非制造业部门纯利润率 (1948~1999 年) (经间接营业税调整)

制造业部门一半的水平。前者产品价格的年均增长率为 2.3% 而后者产品价格的年均增长率为 4.25% (见表 1-3)。即便考察七国集团的总体经济状况,也可以看到,制造业和非制造业部门在这些年来的利润率变动趋势确实存在明显的差异(见图 1-4)。

**表 1-3 美国制造业与非制造业成本、价格与
盈利能力变动的对比 (1965 ~ 1973 年)**

		变动百分率	
		制造业	非制造业
经间接营业税调整	纯利润率	-5.5	-3.0
	纯利润比重	-2.7	-2.0
	实际工资	1.9	2.7
	产品工资	4.0	2.8
	劳动生产率	3.3	2.35
	名义工资	6.4	7.2
	单位劳动成本	3.05	4.7
	产品价格	2.3	4.25
	资本产出率	3.2	1.1
	实际资本产出率	-0.4	0.0
	资本存量价格	5.2	5.6
未经间接营业税调整	纯利润率	-6.0	-1.7
	纯利润比重	-2.8	-0.7
	实际工资	1.9	2.7
	产品工资	4.2	2.7
	劳动生产率	3.3	2.35
	名义工资	6.4	7.2
	单位劳动成本	3.05	4.7
	产品价格	2.1	4.4
	资本产出率	3.4	-1.0
	实际资本产出率	-0.4	0.0
	资本存量价格	5.2	5.6

必须强调的是,整个私人经济部门利润率下降的原因在于制造业部门利润率的下降,而后者又源于全球制造业产品价格上涨所呈现的相对低迷状态。显然,如果非制造业部门的公司能够成功地“存储”所有来自于制造业产品价格缓慢增长的收益,那

么其利润增长额就足以弥补制造业所遭受的利润损失，非制造业部门的利润率上升将抵消制造业部门的利润率下降，从而私人经济部门在总体上不会出现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但是，考虑到制造业的产品构成，尤其是消费品的重要地位，我们会发现，工人肯定要求分享部分收益，实际工资因此提高。不仅如此，对于非制造业部门而言，实际工资的提高并不会导致雇主所获利润率的下降，因此该部门没有必要抑制工资的增长。由此引发的后果是，美国私人经济的利润率在 1965 ~ 1973 年间经历了显著的下降，降幅高达 30%；七国集团的总体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平均下降幅度也达到 20%。^①

以上分析暗含的一个最终结论是，美国经济盈利能力的下降和利润率增长的停滞，不是像人们通常论证的那样，或是因为技术潜力的枯竭所引发的生产率增长放缓，或是因为强大的劳工力量所推动的实际工资的过快上涨。生产率增长放慢决不可能是盈利能力下降的根源。原因十分简单，制造业部门的利润率下降最为严重，但其生产率事实上却在提高，1965 ~ 1973 年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3.3%，超过了 1950 ~ 1965 年经济繁荣期 2.9% 的年均增长速度。

不仅如此，如果生产率增长放慢的出现是因为技术潜力的耗尽，那么合理的预期后果应当是，生产率的增长将相对放慢，并或多或少地走向持续的负增长。但事实上，相对于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及其他七国集团国家的生产率在 60 年代一直保持着加速增长的势头，并持续到 70 年代初；之后，也就是从 1973 年开始，生产率的增长态势突然被一场剧烈的、不连贯的下降所替代。准确地讲，美国的生产率在 1973 年以前令人惊讶地保持了 35 年的持续增长，但在随后的 6 年间其生产率增长则近乎停滞。

阿姆斯特朗 (Armstrong) 等：《1945 年以来的资本主义》，第 352 ~ 353 页，表 A1、A2。